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 學 研 究

第 五 卷

主 編

袁 行 霽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武樹臣	孫 靜	袁行霽	陳 來
鄒 衡	程鬱綴	趙匡華	趙為民
閻步克	蔣紹愚	樓宇烈	嚴文明

秘 書

孟 二 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論乾嘉考據學派別之劃分 及相關諸問題

漆永祥

乾嘉考據學派別的劃分，關係到這一學術的淵源、方法、特點及評價等多方面的問題，是乾嘉考據學研究中一重要議題。本文在對前人研究成績透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派別劃分見解，並對相關諸問題進行了探討。

一、諸家分派說及其局限性

乾嘉時期，考據學家在討論自己所終身從事的學術時，並無明顯的派別觀念。對於清初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胡渭、張爾岐、臧琳諸大師，他們是共同尊尚，別無異議。在論及清中葉考據學界時，往往是惠棟、戴震共為宗主，即汪中所謂二人“咸為學者所宗”，既不區分為兩派，更不像今人那樣貶惠而褒戴。^[1]當時學者對考據學家之地域分佈多所措意，屢有論說，但這並不能說明乾嘉學者有以地名學或區分學派的觀念，他們多為言其故里學術之盛，兼有自誇或推尊他人之意。^[2]所以，直至清末，考據學界雖時有論辯，觀點各異，但並不分門別派，殆為事實。

(一) 吳、皖兩派說及多派說

對乾嘉考據學明確劃分派別，始自章炳麟。章氏認為清初諸人雖皆為碩儒，但“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元明譚言”。又云：

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為

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刑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3]

章氏既將考據學家分爲兩派，又將當時學者分隸惠、戴名下。吳派有惠士奇、惠棟、江聲、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及江藩等；皖派有江永、戴震、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承珙、培翬）、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等。章氏又將萬斯大、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人劃出，另爲浙東一派，故其分法實爲三派。

章氏之說，實際上是本江藩《漢學師承記》一書的卷次稍加變通而成。^[4]章氏之後，又有梁啟超以乾嘉時期爲清學“全盛期”，以惠、戴諸人爲“正統派”，而派別區分，全用章氏之說，所不同者，他在吳、皖、浙東之外又分出揚州一派，以焦循、汪中爲代表，故梁氏實分爲四派。

但兩家所論，皆以吳、皖兩派爲主且強調有加，後人尊從其說，幾爲定論。近十餘年，也有學者提出，乾嘉考據學與歐洲的經院學派和啓蒙學派一樣，認爲乾嘉學術的末流是經院派，亦即吳派；而主流爲啓蒙派，亦即皖派。^[5]但終歸不出吳、皖兩派之範圍，只是評價高下不同而已。

50年代以來，學術界主張以吳、皖、揚州三分乾嘉學派的學者不少，如張舜徽、柴德賡、戴逸、王俊義、黃愛平、陳祖武諸先生皆持此說，他們大都認爲揚州之學博大精深而講求通貫，所謂“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6]其實，這一觀點可以上溯到阮元對焦循的評價，阮氏曾稱焦氏爲通儒，並讚許其學“精深博大”。^[7]

又有學者不滿於吳、皖分幟，主張稱乾嘉學派足以當之，不必再分派別；也有人不滿於兩派、三派之分，而主張在經、史之別下按地域分爲多派，如於經學中分出蘇南、徽州、蘇北、晉、浙、魯六派，史學中分出正史、疑古辨僞、博學三派，等等。而且，隨着目前國內地域經濟的開發和地域文化研究的趨熱，這種按地域細分學派可能還會出現增強的勢頭。

(二) 諸家分派之局限性與惠、戴、錢三派的提出

各家對乾嘉學派的劃分已如上述，諸家所論，並皆有理，但也皆有局限，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吳、皖（或加上浙東、揚州）之分，不能反映師承淵源。師承淵源關係是判別學術派別的重要標志之一，學者對某一大師或親炙，或私淑，或受其影響而近其學，方可歸入一派。皖與揚州之分，實為同一師承而強分為二，揚州學者中的王念孫父子及任大椿等人親出戴震門下，凌廷堪為戴氏私淑弟子，後人將他們或歸皖派，或自成派，自亂其法。汪中之學也近戴震，而梁啟超將其既隸歸吳派，又為揚州派之主將，矛盾錯出，類似的矛盾不少。

第二、各家分派難以準確反映學派特點。學派劃分，最主要的依據不在師承、地域或其他表徵，應以學派特色為主要劃分標準。以汪中等人隸吳，以盧文弨等人隸皖，尤其是以錢大昕隸吳等，使吳、皖各自的學術特色泯而不顯。至於浙東學派的章學誠及疑古辨偽派學者崔述等，則更是在學術宗主及風格特點上異於考據學派，不應混同並論，愈治愈紛。

第三、各家分派，都忽略了當時北方的考據學家。由於考據學興起於江、浙等地，後人研討其學，對北方學者如朱筠、紀昀、周永年、孔廣森、郝懿行、桂馥、張澍等，或提及一二，或並皆略去。他們在考據學領域建樹良多，不可忽置。故諸家分派，尚有闕失。

第四、以地名學並不為錯，此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常見的現象，名稱只是學派之代稱或習慣稱法，故吳、皖之名下雖並不皆吳、皖之人，也無可厚非。但不能過於強調地域特色對劃分學派的作用，學分多派，以地域為主並不是乾嘉考據學的派別特色，故我們不贊同苛細地以籍貫名學和劃派。

第五、由於分派之不當，在探求乾嘉考據學之成因、方法、特點及評價諸方面，都帶來了不少困難，不利於對這一學術的深入研究。

我們的分派，是在認可惠、戴兩派之分的前提下進行的：其一、將考據學家限制在“正統派”範圍之內。浙東學派如章學誠，常州學派如莊存與、張惠言，辨偽學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皆不在討論之列。其二、學派

劃分以學術特點為主，參考師承、地域等因素，並考慮到將當時北方學者各歸其所近之派。其三、歸揚州派而入戴派。因這兩派實為一派，揚州學者的通學是對戴派之發展，而非異幟。其四、從惠派中析出錢大昕一派，稱錢派，因其學既不同惠，也不同戴，而自為一派之首。故本文將乾嘉考據學家分為惠、戴、錢三派。^[8]下面將討論我們分派的理由及與其相關諸問題。

二、惠、戴、錢學術淵源考辨

清代考據學的成因，有其學術內部自身發展的理路和複雜的社會背景，此不在本文探究的範圍之內。在清初考據學發展的大背景下，作為乾嘉考據學各開門派的宗師，惠棟、戴震、錢大昕三人受自身條件和周圍環境的影響，又有着各自的學術淵源。

（一）惠棟學術淵源考辨

惠棟學術的直接根底是其綿長的家學淵源。清人因諱言明末事，論惠學往往上推至其祖父周惕而止。實際上，在明末時惠棟的曾祖父有聲就已經開始了恢復漢學的工作。有聲為明末貢生，“嘗閔漢《易》之不存也，取李氏《集解》所載者參眾說而為之傳，天、崇之際遭喪亂散佚”。^[9]入清後，他隱居鄉里，以九經訓弟子，尤精於《詩》，不為外人所知。

有聲子周惕為康熙辛未（1691）進士，曾官密雲知縣。他承其父業，邃於經學，時人稱其治《詩》為“毛、鄭之功臣，而夾漈、紫陽之諍子”。^[10]又從徐枋、汪琬遊，工詩古文。有《詩說》、《易傳》、《春秋問》、《三禮問》等。周惕子士奇為康熙己丑（1709）進士，官至廣東學政、侍讀學士等職。精於經術，又曾入王士禎門下，善詩文辭賦。有《易說》、《禮說》、《春秋說》等。周惕、士奇“兩世並以文章博學為海內泰山北斗，列翰苑，為顯人”。^[11]都是集經學、辭章於一身的學者。

惠氏四世家學，至士奇子惠棟而終於大放異彩。惠棟稱自己“弱冠即知尊尚古學，年大來兼涉獵於藝術”，^[12]中年以前，他學博而雜，於經、史、諸子、

詩論、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又以王士禎的“小門生”身份為其註《漁洋山人精華錄》。中年以後，惠氏轉而專力於漢《易》的搜輯研究，其學大變，原因有二：

首先，是家庭的變故。雍正五年（1727），惠士奇因奏對不稱職，奉旨罰修鎮江城，以致毀家修城，因產盡停工罷官。惠棟家道中落，饑寒困頓，又連遭兩喪，課徒自給，甑塵常滿。乾隆九年（1744），他參加鄉試因用《漢書》見黜，由是息意進取。惠棟由貴胄公子而降為甚於寒素的身份變化，使他從此失去了裕如的生活與泛覽雜取的讀書治學條件，轉而專意於家學的繼承弘揚，專明漢學而放棄了辭章。而明末以來，蘇州地區一直是抗捐抗稅和反閩黨專權最激烈的地區，故學者多對社會現實持批判態度，對宋明理學深致不滿，惠棟家庭的巨變，使他更多地接觸下層群眾，這對他形成激烈抨擊宋明理學，將天理、人欲統一起來，由宋明學者好言天道轉而多言人事的思想，應該說有很大的影響，而他對理學的批判又給了戴震等人很大的影響。

其次，惠棟治學是在對清初諸大師批判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的。惠氏《左傳補註》是在繼承顧炎武以石經校勘《左傳》的基礎上專明賈、服之學；顧氏主張《易》之體例應將《彖》、《象》與卦爻辭分立，惠氏《周易述》正復如此。惠氏辨《尚書》之偽是在閻若璩的基礎上進行，辨圖書之偽又大同於胡渭。他的《後漢書補註》又採何焯《義門讀書記》中條目甚多。但他對清初學者並不滿意，認為他們“非漢非宋，皆思而不學者也”。^[13]故棄宋而尊漢，向專明漢學的方向發展。

這樣，惠學以中年為界，前期泛覽雜取，後期特別是四十歲以後專明漢學，尤致力於漢《易》，對宋明理學與帖括之學嚴加痛責，所謂“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14]於是，其學既不同於乃祖乃父，更不同於清初學者。王昶論惠學云：

先生生數千載後，眈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

可謂豪傑之士矣！^[15]

至此，新一代學術日漸形成，而惠棟一派之基也由此而奠。

（二）戴震學術淵源考辨

戴震之學源於江永，人皆知之；而戴學後期受惠棟影響巨大，則人多忽置不問。

江永少時習帖括之學，後見明代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而大好之，遂苦心造詣，精於《禮》學（邱氏書補真德秀《大學衍義》之所不逮，在明代大受尊崇）。又因朱熹晚年著《儀禮經傳通解》未成，遂竟其業而成《禮書綱目》，又著《近思錄集註》，並認同孔孟程朱之道統之傳。江氏又精於音聲詁訓，有《古韻標準》等。故江永之學源自宋學，雖漢宋兼採，但仍深入宋儒之室。所以，錢穆謂“蓋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風未歇，學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16]又云“徽人群居山中，率走四方經商爲活，學者少貧，往往操賤事，故其風亦篤實而通於藝”。戴震在三十二歲以前，其學“尚名物、字義、聲音、算術，全是徽人樸學矩矱也”^[17]。

因此，戴震前期入江永門下，讀宋明人書，治名物、字義、聲音、天算諸學。他的《策算》、《六書論》、《經考》、《屈原賦註》等多成於此時。他主張學術以義理、考覈、文章三分，但“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18]對漢宋之學，他認爲漢鄭玄，宋程子、張子、朱子之學“至博至精，然猶得失中判”，因爲“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19]於漢宋之學各打五十大板。

戴學大變，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見惠棟之後。是年，二人相遇於揚州，論學大合，戴學從此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治經由漢宋兼採到獨重漢儒。

戴學前期，主張義理爲考覈之源，而後來又主張“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20]則已變爲義理寓於考覈之中。其前期治學，於漢宋無所專主。如前期所著《毛鄭詩考正》、《皐溪詩經補註》，既不黨《詩序》與毛、鄭，也不拘守朱熹《詩集傳》，或兼採諸說，或細繹經義。但在與惠氏論

學之後，“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不能擇所專主”。故治經一方面向求古化發展，另一方面則嚴汰宋儒之說而盡採漢儒之說。我們以其後期所著《尚書義考》爲例以明之。^[21]此書《義例》云：

有書契以來，莫古於《尚書》。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使其說皆存，用備參稽，猶不足以盡通於古，况散佚既多，則見者可忽視乎？故是編於各書所引歐陽、大、小夏侯說及賈、馬、鄭之註，詳略必載。古註語簡義精，雖盡收不見其多。至宋以來鑿空衍說，載之將不勝載，故嚴加刪汰。

此說與惠棟一致無二，如同轍出，漢人之說詳略必載，宋人之說嚴加刪汰，《尚書義考》中校勘訓釋，大同於惠棟《尚書古義》，凡惠氏因不明古音而拘形索義所犯的錯誤，精於古音假借的戴氏也竟蹈其誤，後來王引之《經義述聞》中於惠、戴皆有批駁，正是他們泥於漢儒舊說導致的結果。

第二、義理由尊重宋儒到大反理學。

戴學早期，治經漢宋兼重，對程朱理學，並無惡感。其前期所著《經考》，類似治經資料長編，^[22]此書採宋儒之書最多，對程朱以理繩經抱支持態度，並不駁斥。但戴學後期卻大反理學，激烈抨擊宋儒，對理學進行新的闡釋，對其影響至大的，當爲惠棟。翁方綱曾論戴氏論性理之說與惠棟《周易述》中說法相似。^[23]錢穆接着此論說：

蓋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有聞於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24]

錢氏還認爲，戴氏《原善》三篇，“其文頗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響”，且成書於見惠棟之後，擴大成三卷爲乾隆三十一年（1766）之事；至於《緒言》和《孟子字義疏證》則成書更後，此論甚確。今人冒懷辛論戴氏此數種書成書次序爲：

《原善》三卷→《緒言》三卷→《孟子私淑錄》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25]

由此可見，戴氏書成於見惠棟以後，其批判理學正是繼惠氏之風而起。惠氏批判宋儒者：一則以其解經曲從義理，空疏無補於經且援釋道入儒；二則駁理學家將天理、人欲對峙，主張二者統一；三則批判宋儒專言天道而捨人事，主張輕言天道而重人事。這些皆為戴氏接受，戴氏將理學的闡釋客觀化、倫理化、平易化，是在惠學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加之戴氏一生坎坷，多次參加會試不第，往來歙縣、揚州、北京、汾陽等地，親見富商大賈與豪門權貴之奢侈和貧民之憔悴，對“理學殺人”的體會也日漸加深，後人謂其義理之學為替平民訴冤的“平民哲學”，不無道理。

由此可見，戴學前後區別很大，其學前期受江永影響，後期受惠棟影響，後人謂其義理之學間接受到顏元的影響，遠不如說受惠棟啓發理由更充分。至戴學前後一貫者，則在於其自始至終主張由考據而進推義理，並將考據與義理的結合付諸實踐，此為戴學別於惠棟之處，亦為戴派之主要特色。

（三）錢大昕學術淵源考辨

錢大昕之學，因江藩《漢學師承記》言其曾從惠棟、沈彤游，故後人將其歸入惠派。然而，深入考察錢氏之學，則並不如此簡單。

嘉定一地，明中葉以前寂然無聞，錢大昕論其故里之人文歷史云：

嘉定瀕海小邑，無名山大川之勝，其在赤縣神州中，僅如太倉之秣米。且建縣於南宋，宋元以前，未有人文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樸魯，仕宦無登要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尚古學，其後黃忠節公文章氣節，照映千古。國朝則菊隱、樸村、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幟詞壇，邑雖僻小，其名猶著於海內，則以鄉之多善士焉。^[26]

錢氏論嘉定之學興起於明嘉靖、隆慶間，當時正是王世貞、李攀龍等“後七子”之文盛行之日，但嘉定之學卻如王鳴盛所說是“我邑在勝國時崇尚樸學，不染王、李俗氛”。^[27]這是因為嘉靖二十一年（1542）歸有光移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故當時嘉定人士多師承歸氏，如徐允祿、唐時昇、婁堅、程嘉

燧、李流芳等並一時之雄。歸有光治學經史兼通，與當時理學家迥異，又曾參與撰修《世宗實錄》，故嘉定學者也多留意於史。至明末清初，尚有嚴衍、黃淳耀、李宜之等人治史。嚴衍終身治《通鑑》，錢大昕稱其治史能“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辨正，皆確乎不可易”，為胡三省之後一人而已。^[28]又如李宜之“嘗言二十一史，或紀志表傳不符，或官爵姓名謬誤，或年月時世互差，擬刪其煩複，勒為一編，未就遭變”。^[29]此可見嘉定一地，自有其學，鑿鑿然甚明，錢大昕後來治史正是繼承了嘉定學人之傳統。^[30]

為錢大昕自小奠治學之基的，是他的祖父錢王炯。錢氏之父，終身只不過是一飽食終日而遊山玩水的“雅士”而已，而他的祖父卻在治學、做官及為人處世諸方面都給了他以重大的影響。王炯一生經康、雍、乾三朝，是一位學有素養的隱德君子，其學既承嘉定前賢之遺風，又受清初考據學風氣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他曾遊歷過浙東，濡染到浙東學派的治學之風。其治學方法是：

讀書必先識字。故於四聲清濁，辨別精審，不為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經》句讀，字之偏旁，音之平仄，無少訛溷。^[31]

從識字審音入手治學是乾嘉學者的不二門法，王炯所做正是如此。錢大昕又記其祖父之逸事云：

有客舉王子安《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二句對屬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疊韻也；‘丘墟’，雙聲也。疊韻雙聲，自相為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32]

此可見王炯對故訓音聲有深入的研究，並著有《字學海珠》一書。錢大昕五歲時即從王炯學，他後來在古聲紐的研究上戛戛獨造，超邁時人，從這裏可窺見其淵源之所自。

錢大昕之學，於浙東學派宗旨不遠，他主張經史不分，二者無別，等量齊觀，^[33]與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並無二致。他對萬斯同之學也加以肯定並為之立傳，承其學風。他同邵晉涵、章學誠等人論學多合，關係密切，有濃厚的浙東派風格與特色。

在當時學術界，給錢大昕影響較大的，另有惠棟與王峻，王氏為大昕入紫

陽書院時的院長，乾隆十四年（1749）錢氏二十二歲入紫陽書院，王氏“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錢氏稱“吾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34]。也在是年，惠棟先是聽王鳴盛稱其“同邑諸生錢大昕，字曉徵，十七史皆能成誦”。^[35]接着，二人相見於紫陽書院，結為“忘年交”，惠稱錢為“可與道古者”。^[36]有着深厚小學、史學根底的錢大昕，經名家熏染，終成為一代宗師。

由此可知，錢大昕之學，繼承嘉定學者樸實嚴謹、通經讀史尤其是注重史學的傳統，同時又接受了浙東學派的治史風格，受到惠棟等人治學風氣的影響，而後形成了錢氏博通經史，尤精史學的學術特色，其學帶動一批學者，成為惠、戴之外的另一考據學派分支。

三、惠、戴、錢學術交往與錢大昕的學術地位

（一）惠、戴、錢學術交往與關係

惠棟、戴震、錢大昕各自的學術淵源與演變，已如上論。三人之中，惠為長輩，戴、錢則為同齡人。惠氏生前，曾與戴震在揚州論學，又和錢大昕在紫陽書院切磋，對二人影響很大。惠氏歿後，戴、錢皆給予高度的褒揚，戴震論惠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墮未墮埋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37]錢大昕也論惠氏說“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將其比諸漢儒何休、服虔之間。^[38]戴氏之言，是在與惠棟見面近十年後所述，錢氏更是在與惠氏論學後四十餘年才有是言，二人皆將惠學樹為典型，歷久不替，對其黜宋復漢之功加以充分的肯定。

而戴、錢之交往則有一個互為師友、交相影響的過程。二人初次交往，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39]當時錢大昕已中進士並被座主錢維城稱為是科“古學第一人”。^[40]而戴氏則因避仇入京，聲名皆無，狼狽困頓之至。錢大昕論當時二人相見時的戴氏是：

性介特，多與物迂，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幾不繼，人皆目為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

去，予目送之，嘆曰：“天下奇才也！”^[41]

兩位學者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見面且論學大合，錢氏將戴氏推薦參加秦蕙田主持的《五禮通考》之編纂，又把他介紹給當時名流如紀昀、盧文弨、朱筠、王鳴盛、王昶等，戴氏名噪一時，聲聞海內。此後，錢氏在京官運亨通，而戴氏則往來於南北，二人相見論學並交相影響，在經史、小學、性理、天算諸學上既各名其學，又相契甚多。至清廷開四庫館，戴氏以布衣身份入館修書，結束了其顛沛流浪的生活，不久，錢大昕離京南下，二人終身再未謀面。

戴、錢二人相互推揚，給對方以很高的評價。錢大昕稱戴震天算之學“學通天人”，^[42]又稱其校《水經註》“於經註混淆之處一一釐正，可謂大有功於鄺氏矣”。^[43]戴氏歿後，錢氏為作佳傳，盛讚其學，其論戴氏：

少從婺源江慎修遊，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註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44]

錢氏清晰地勾勒出了戴震治學的根基及演變次序，對戴學之表彰不遺餘力。相對而言，戴震對錢大昕之學的評價要少得多，他評價錢氏參編的“《五禮通考》中，說話多有似是處”。^[45]此外則僅有一句盡人皆知的話，即戴氏宣揚“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人”。^[46]戴氏毅然以第一人自居，但以錢氏居次席，也足見其對錢大昕的重視與推獎。後來尚有人替錢氏抱不平云：

戴東原先生窮走京師，因錢少詹遊揚之言，其名始著，而戴乃云“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人”。錢學之博，非戴君所可望，少詹且甘之，為作《戴先生傳》附於潛邱、定宇、慎修諸先生後，其度真不可及！^[47]

戴、錢之學，各有千秋。然戴學未顯時，錢氏為其揚名；戴學名天下，錢氏引為知己，禮敬推服不已；戴氏歿後，錢氏又蓋棺論定，推闡肯定其學。即此點而論，錢氏虛懷若谷、不計名利的高風亮節，卻超邁戴氏遠甚。前代大師之氣度風範，可為萬世之楷模！

(二) 錢大昕學術地位與作用

乾隆二十三年(1758)，惠棟逝於家中。此時，戴震與錢大昕業已在學術界創下聲名並各有建樹。四庫館開，戴氏入館，成爲考據學在北京的實際首領人物，而錢大昕則官廣東學政離京南下。四十二年(1777)，戴氏歿於任上。翌年，錢大昕任鍾山書院院長，先後在鍾山、婁東、紫陽書院任院長職，執東南學界之牛耳長達近三十年，他所處的地位與作用，是當時名家如紀昀、王念孫、段玉裁、王鳴盛、邵晉涵諸人所無法比擬和替代的。

自主講鍾山始，錢氏即“與諸生講論古學，以通經讀史爲先”。^[48]尤其是紫陽書院爲錢氏肄業之地，也是他執教最長的地方(先後達十六年)，他到紫陽後的情形是：

追憶四十年前舊事，皆賴名師益友切磋琢磨之力，得窺古人堂奧，遂奮然以振興繼美前修爲己任，與諸生譚經史性命之旨，切論以浮慕虛名無補實學，由是士之馳逐聲華者漸變氣質。……三吳士人益駸駸向化，並有他省好學之儒不遠千里載贄執經者，爲向來未有之盛事。^[49]

錢氏這種中心與主導的地位與作用是明顯的。一方面，他執掌杏壇，培養了大批考據學人才並導引學術風氣。“一時賢士受業門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學，實事求是。”^[50]當時學者洪亮吉也稱錢氏說：“近時樸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51]另一方面，他所在書院，成爲東南學術界考據學研究與交流中心。“四方賢士大夫下逮受業生徒，咸就講習，折中辨論文史”。當時無論名家還是後學，如盧文弨、段玉裁、畢沅、孫星衍、梁玉繩、黃丕烈、顧廣圻、洪亮吉以及何元錫、鈕樹玉、李銳、夏文燾等，或叩問疑義，或商論詩文，或持示古本書籍，或鑒別舊拓碑帖、鍾鼎款識以及法書名畫，錢氏“無不窮源竟委，相與上下其議論，至人各得其意以去”。^[52]在錢氏影響下，不僅其家舉族治學，而且形成了以他爲中心的錢派學術群體。

戴震生時，錢氏甘以第二人自居，而戴氏歿後，錢大昕得到的讚譽與評價甚或要超出惠、戴，我們以段玉裁、阮元、凌廷堪、王引之、臧庸、江藩所論

以明之。段氏在《潛研堂文集序》中稱錢氏云：

先生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於經文之外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實、年齒之紛繁，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曆法，無不瞭如指掌。至於累朝人物之賢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難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其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蓋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謂深矣！

此段氏所舉錢學大略，尤其是他在史學上之貢獻遠非他人可以企及，下文又論其詩文之不凡。阮元在為錢氏所作《十駕齋養新錄序》中，盛讚錢氏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九難”，即人倫師表、道德性理、經學、史學、天算、地理、小學、金石與職官、詩古文詞九方面的成就，認為自清開國以來惟錢氏能“兼其成”，所謂“求之百載，歸於嘉定”，是阮元認為錢大昕為集大成式的耆學蓄德之大師。而凌廷堪在給錢氏的書信中，也有類似的觀點。其云：

學術自亭林、潛邱以來，士漸以通經復古為事，著述傳業者不下十餘家，求其體大思精，識高學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紹兩漢者，惟閣下一人而已。^[53]

又王引之《詹事府少詹事錢先生神道碑銘》中，所論亦大同於阮、凌二氏。其云：

古之治經與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數，證之諸子、傳記以發其旨。自講章時藝盛行，茲學不傳久矣。國初諸儒起而振之，若崑山顧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學皆實事求是，先生生於其後而集其成。

當時學者中，又如臧庸為盧文弨的弟子，但他評價錢大昕品學交粹，“實事求是，不輕許可，畜道德，能文章，負天下後世重望，為數百年間所勿易觀者耳！”^[54]而江藩《漢學師承記》中，記錢大昕之篇文字最多，他在論錢氏博學

專精，“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之後，鍼對戴震以天下第一人自居而置錢氏於次席的說法，江藩比較二人云：

然東原之學，以肆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55]

是江氏以錢氏爲一代儒宗，且認爲錢優於戴。以上諸說，除段玉裁與錢氏爲同輩外，餘皆爲後學，他們皆以錢氏爲集大成式的一代儒宗，錢氏之學術地位與作用於此可見。

四、惠、戴、錢三派人物歸隸與學術特色比較

我們既分乾嘉考據學家爲惠、戴、錢三派，又論述了三派學術各自之淵源及分出錢派的理由。現論述三派人物之歸隸及特色如下：

（一）惠、戴、錢三派人物歸類

第一、惠派人物歸類。

惠派之學，上承惠棟四世家學，斷自乾隆朝始，則有惠士奇、惠棟、沈彤、江聲、余蕭客、王鳴盛、王昶、盧文弨、顧廣圻、臧庸、江藩等。而當時北方學者如紀昀、朱筠、周永年等，因其學類惠派，故亦歸入此派。

盧文弨之學，因江藩稱其官京師時“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56]故後人多將其隸歸戴震一派。但盧氏治學，專力於目錄、版本、校勘之學，論學主張多合惠派。如他說：“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其習談多古音。故其訓詁要與本旨爲近，雖有失焉者寡矣。”^[57]因此他主張“凡傳古人書，當一仍其舊，慎勿以私見改作”。^[58]在具體校勘刻書方面，他提出“相形而不相掩”的校勘原則，與顧廣圻所倡“不校校之”原則殊途而同歸，二人治學風格相類相似，故後人合稱爲“盧顧”。因此，盧氏之學與惠派爲近，由於他與戴震、錢大昕相友善，故反對學者“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59]其學主通變而不拘守，但他視金石古器之文爲几牘之

娛品而不重視，則其識見顯然比不上錢大昕等人。故我們將盧文弨與其弟子臧庸改隸惠派。

北方學者中，紀昀之學，功在“四庫提要”之主纂，其論學雖主調和漢宋，但實際是崇漢貶宋，與惠派同。朱筠之學，主張“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寧爲墨守”。^[60]更不出惠氏宗旨。周永年之學，長於校勘、輯佚，所治亦不出惠學範圍。故將他們附歸惠派，當無差誤。

第二、戴派人物歸類。

戴震一派，有江永、戴震，與戴氏相友善而互爲師友者，則有金榜、洪榜、程瑤田等人。戴氏弟子及再傳弟子，則有段玉裁、任大椿、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陳奐諸人。受其學影響或學術類戴氏者，有其鄉胡匡衷、胡培翬、胡承珙，北方學者郝懿行，揚州學者汪中、焦循、李惇、賈田祖、劉台拱、凌廷堪、阮元等人。

揚州學者，後人或歸之吳派，或單另成派。我們認爲，揚州之學，乃戴派之流衍。汪中曾論乾隆時揚州之學云：

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爲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爲之唱，而君（指李惇）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61]

此論雖並尊惠、戴，而實際上揚州之學更近戴震。王念孫父子爲戴氏門人，自不必說。汪中與金榜、洪榜等人往還密切，又盛稱戴震爲自清初顧炎武以來集大成式的學者。而汪中之學推闡義理，表彰諸子，“及爲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62]此更爲戴派特色。李惇、劉端臨、賈田祖諸人，如劉氏之學不僅主義理，且精理學，時人以“小朱子”目之，更爲戴派中之異軍。焦循之學，自其曾祖父焦源即治《周易》，祖鏡、父蔥並皆方正而有隱德，傳《易》學，故焦氏亦可謂四世傳經，堪稱家學。其學主通變、講義理，亦尊戴氏，謂戴學“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63]故焦氏之學仍當附戴派爲近。至於凌廷堪，

他自幼即“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64]自稱為戴氏“私淑之末”，他和阮元歸隸戴派，人無異議。郝懿行官京師間，日與王念孫父子講論切磋，其學長於以小學治經，歸之戴派，亦當毋庸置疑。

第三、錢派人物歸類。

錢派之學，始自錢大昕，其舉族治史，有大昕弟大昭、從子塘、坵、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人稱“嘉定九錢”。受其影響而學術相類者，有邵晉涵、洪亮吉、孫星衍、朱駿聲及北方學者張澍、邢澍等，弟子承其學者則有李銳、夏文燾、鈕樹玉等。

邵晉涵之學，既為浙東派大師又是考據學派主將，他不像章學誠那樣與考據學派齟齬不合，而是被考據學家視為自家學術之主力。其學類錢大昕，不僅在於二人並皆專力於史學且都有浙東派之治史風格，更為重要的是邵氏之學受錢學影響很大。錢氏既為邵氏科場上的座主，又為他學術上的導師，邵氏專力於治宋史，正是錢氏啓發之結果。錢氏嘗云：

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蹟不完，即褒貶亦失實。君（指邵晉涵）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65]

對於邵氏之師從錢氏，時人也有論述，如洪亮吉給邵氏的詩中即稱“君師錢少詹，精識世所無”。^[66]江藩也稱“二云之傳，則源本曉微”。^[67]然則邵氏歸於錢派，當不成問題。至於孫星衍、洪亮吉，其學以經史見長，亦精輿地、金石等學，二人皆心儀錢學，文中稱時賢之名，必以錢氏為最先，孫氏出錢氏門下，洪亮吉不僅如前所述讚譽錢氏是“精識世所無”，且謂“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68]是孫、洪之學，亦當歸之錢派。朱駿聲為錢大昕主紫陽書院時之弟子，承錢氏之小學。張澍、邢澍雖僻地西北，但二人皆官南方，與錢大昕、大昭、孫星衍、洪亮吉往還密切，其學長於金石、輿地、姓氏之學，亦與錢派為近。

（二）惠、戴、錢三派學術特色比較

第一、三派信古與尊漢程度比較。

乾嘉考據學既稱古學，又稱漢學，是因為他們從古尊漢，繼承發揚了漢儒治學重小學訓詁與名物典制的傳統，從這點而言，遠紹漢儒是三派共同的特點。但在信古與從漢程度上，卻是同中有異，特色鮮明。王鳴盛曾記他和戴震的一次閑談說：

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與定字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字求古，吾求是。”嘻！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捨古無是者也。^[69]

惠派求古，戴派求是，王氏站在惠派立場上說話，認為“捨古無是”。錢穆對此論云：

捨古無以為是者，上之即亭林捨經學無理學之說，後之即東原求義理不得鑿空於古經外之論也。然則惠、戴治學，求其歸極，均之於《六經》，要非異趨矣。其異者，則徽學原於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復古，以辨後起之偽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尚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吳學進於專家，而徽學達於微實。王氏所謂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70]

此說殆為公論。惠派所求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信古從漢，所治之學，多尊從漢儒某一家之學，詳辨而明證，所謂“一以漢人為師，鄭玄、許慎，尤所墨守”，^[71]故其學專門而守舊。戴派所求在“會諸經而求其通”，故雖出入漢儒門戶但不守其藩籬，講求綜貫會通，不偏主一家，與前人之說不合，則勇於改為而下以己意。

而錢派則折衷於惠、戴之間，倡“以古為師，師其是而已矣”，因此錢氏一方面講“訓詁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72]但另一方面，他又特別強調“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73]“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74]故錢學主尊古惜古，但反對泥古倭漢，也反對勇改鑿空，其學較為謹慎。

第二、三派對博涉與專精之側重比較。

清代考據學自顧炎武等人始，就很重視博聞多識。到乾嘉時期，就惠、戴、錢學而論，既能博涉又兼專精是他們共同的特點。後人多論惠學不精，實際上惠氏《九經古義》、《周易述》、《後漢書補註》諸書，皆精博過人，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大量採用惠說即為明證。但綜三派而論，惠派側重博涉，戴、錢二派則主精審會通。如王鳴盛云：

李琰之嘗論崔光博而不精，劉芳精而不博，學之欲兼精博也難哉！要以鈔緝薈萃，備下學之考稽，博為首重矣。^[75]

此正惠派學術特色及其重博之原因。而戴、錢二派所治如小學、天算、律呂諸學，皆務求精審別辨，由博返約，綜貫會通。不僅戴、錢，即焦循、凌廷堪、阮元、錢塘、錢坫等人之學，亦皆主博綜會通，精審不苟，顯異於惠派之王鳴盛、江聲、臧庸、江藩等人。

第三、三派治學門類範圍比較。

在四部書研究比重上，三派學者皆兼及經史子集，都有整理研究。但相對而言，惠派長於經、史；戴派多治經、子、小學；錢派則重在經、史、小學。以具體學科門類而論，惠派擅長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註釋諸學；戴派側重文字、音韻、訓詁、目錄、校勘、天算、名物典制、地理、樂律諸學，尤為突出者則為該派學者多兼治義理之學；錢派長於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天算、名物典制、地理、職官、金石、避諱、氏族諸學。三派學者都是或諸學兼通，或專名一學，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五、惠、戴、錢三派學術評價諸題

（一）諸家之貶惠而褒戴

在乾嘉考據學分派上，前人既分吳、皖兩派，又多貶惠而尊戴。批評惠派者，一是其學好博不精，倡自“四庫提要”；一是譏其好古佞漢，始於王引之。

然而《提要》對戴震也有微詞，紀昀、臧庸、王引之等人對戴氏也有批評。自章炳麟以吳、皖中分乾嘉考據學，貶惠尊戴之說方日起而日興。章氏既論惠派“爲博而尊聞”，戴派“綜刑名，任裁斷”，又云：

惠氏溫故，故其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爲作也。^[76]

此說有是是不是，章氏雖不滿於惠派，但尚留有餘地，至梁啟超，則將清學之罪全歸於惠派。其論惠派云：

平心論之，此派在清代學術界，功罪參半；篤守家法，令所謂“漢學”者壁壘森固，旗幟鮮明，此其功也；膠固、盲從、褊狹，好排斥異己，以致啓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闕焉，此其罪也。清代學術，論者多稱爲“漢學”，其實前此顧、黃、王、顏諸家所治，並非“漢學”，後此戴、段、二王所治，亦並非“漢學”，其“純粹”的“漢學”，則惠氏一派，詢足當之矣。……故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77]

自此以往，學術界遂幾成定論，貶惠尊戴，50年代以來更是愈演愈烈，衆口一辭，至今未已。

（二）惠派之功過是非

我們認爲，對乾嘉考據學派的評價不能這樣簡單地肯定一派而否定另一派。惠派尤其是惠棟的功績在於：其一、惠氏大倡學宗漢儒，溯前古而求其源，繼承漢儒經師家法之學以及他們重小學訓詁與名物典制之傳統以治學，開乾嘉考據學新風。重師承、傳家學、守專門成爲當時學者的共同特色。

其二、惠氏對理學的批判，給予戴震、錢大昕等人以很大的影響。錢穆稱“徽學與吳學較，則吳學實爲急進、爲趨新，走先一步，帶有革命的氣度；而徽學以地僻風淳，大體仍襲東林遺緒，初志尚在闡宋、尚在述朱，並不如吳學高瞻遠矚，劃分漢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78]此論甚明，後人每以惠學爲落後，數流截源，實非公論。

其三、惠學在治經方法上，打破義疏之學傳統，其《周易述》一書，採漢儒之說，自為註而自疏之，開清人十三經新疏之先河。此在後世為平常之舉，但在當時卻有創新突破的積極作用。

其四、在治史方法上，惠氏《後漢書補註》採用補、註、校相結合的方法，成就突出，影響當時史學研究趨向甚大。惠派學者治史，大多沿此體例而不替。

其五、惠學開輯佚學之科學方法。惠棟在辨偽學方面也頗有成就，但相對而言，他在輯佚學方面貢獻突出。惠氏輯書，從材料上他首重經、子與諸經注疏，次為漢魏間人著述，然後才為唐宋人類書，對佚文來源處理非常謹慎；前人輯書，多不註出處，等於不輯，惠氏所輯則一一註明出處以便檢索及提高可信度，比較科學；惠氏《易漢學》一書，先解釋發明漢人《易》理體例，再補輯大量材料於後，為輯佚學開一變例。孫星衍稱“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為之，《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佈甚夥”。^[79]清初朱彝尊《經義考》也輯錄古書，但遠沒有惠氏影響之大。此後，臧庸、馬國翰、黃奭等人彙輯古書，厥功甚偉。因此，惠棟之學不僅啓迪該派，對整個乾嘉考據學界均起着導師的作用。

惠派好博泛覽，迷信漢儒，如仔細分析，則在當時有其不得不爾的原因：

第一、惠學初起，其倡復漢學，為於舉世不為之日，一方面有創始之功難以周詳的局限；另一方面，其大聲疾呼，崇漢棄宋，有矯枉過正之弊。惠棟倡復漢學的工作，分三步走：先是辨魏晉及宋明學者偽說偽書，接着是搜輯補綴漢儒舊說以見漢學之真面目，然後才是對漢學之研究。在他以後治漢《易》的常州學者張惠言對此深有體會，張氏論惠棟治漢《易》是“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80]這種艱難的治學過程加之惠棟早逝，使他終其身也未能完成《周易述》的系列著述。焦循也嘗論“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81]正好說明了惠棟當日的大量工作是“存其學”，而“求其通”的工作則尚待後人。同時，惠氏為倡復漢學，大聲疾呼，譏宋儒經學為“郢書燕說”，^[82]斥責“宋儒之禍，甚於秦灰”。^[83]但他對漢儒之說，也並非盲從，如

《周易述》中對漢儒五行災異、讖諱之學並不輕從，而且惠氏也有其自己的《易》學思想（此點我們將另文詳論，此不贅述）。他對王、韓之註及後儒之說，亦偶有採擇。但愈往後，惠派學者則多迷信漢儒，到江藩時更嚴判漢宋門戶，如他的《周易述補》對惠棟採王、韓之註及後人說表示不滿，漢以後人舊說皆棄而不取，“方之惠書，殆有過之而無不及也”。^[84]

第二、惠派之好古嗜博，與該派所治之學不無關係。惠派長於目錄、版本、校勘、辨僞、輯佚、註釋諸學。正如我們前文所言王鳴盛所謂“要以鈔緝蒼萃，備下學之考稽，博爲首重矣”。正確切地說明了校勘、輯佚諸學必具博涉的原因。又侯康在《後漢書補註序》中論惠學重博的原因時也說：

康嘗謂註史與修史異，註古史與註近史又異。何者？史例貴嚴，史註宜博。註近史者群書大備，註古史者遺籍罕存，苟非博採兼收，何以離同合異哉！

因此之故，惠派皆重博涉。又由於校註、輯佚、辨僞諸學，愈往前古，愈得其真，故他們主張“學莫貴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85]惠派之好古嗜博，正其從事之學客觀上有此要求所致。

第三、惠派學者在小學研究方面，造詣遠不如戴、錢兩派。因此，治學往往拘形索義，不明音理，這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對學術的深入研究。

（三）錢派學術之功績

戴派學術，近今人所論甚多，因篇幅所限，本文略而不論。錢大昕一派，前人將其歸諸惠派，榮則俱榮，罪則俱罪。錢學自爲一系，前已詳論，惠、戴相繼謝世之後，錢氏又主持東南學術界近三十年，惠、戴之優長缺失，他都耳聞目睹，因此，錢氏折衷於惠、戴之間。反映在治學上，他宗漢排宋，但既不像惠棟那樣拘守漢儒，也不像戴震那樣全盤棄宋。孫欽善先生論錢學云：

從錢大昕的具體言論和實踐來看，他的宗漢排宋思想更側重在方法上，已不像惠棟那樣拘守漢人成果，從而佞漢的偏頗已有所糾正。^[86]

錢氏對性理學說的批判言論多同於戴震，但他肯定朱熹爲“百世之師”的地

位，認為其“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87]錢學也主張由考據而上推義理。在小學研究中，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專明古韻，戴氏兼言古聲，錢大昕、錢坫等人則獨明聲紐；天算學研究上，戴、錢二派“遙相呼應”，^[88]戴氏明九章割圓之術，整理《算經十書》，錢氏精三統術，糾諸史《天文志》之誤，兩派都輕視西學，主張以“勾股御三角”，而史學、金石、職官、輿地、避諱、姓氏諸學則為錢派之長。錢學對近代以來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傅斯年等人之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 餘論

我們既拈出惠、錢二派之學特為論析，以辯明前人之疏誤。若綜而論之，我們認為將乾嘉考據學分為惠、戴、錢三派，較為符合當時學術界的實際情況，三派之分，不僅能使當時學者大部分各有歸隸，而且對進一步探討乾嘉考據學的淵源、方法、特點及評價等諸多方面，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我們的分派只是相對而言，分派是為了更利於研究，而不是為分派而分派。惠、戴、錢三派是乾嘉考據學內部的三個分支，三派同中有異，又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泥於分派而絕對化。例如關於信古與迷信漢儒，前人將此弊歸諸惠派，其實戴、錢二派亦犯有同樣的弊病。以戴派而論，戴震本人治學，後期也是從古尊漢，前已論及。又如金榜之學，“專治《三禮》，以高密為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89]段玉裁治《說文》也常泥於許慎之說，其弟子陳奐《詩毛氏傳疏》更是一尊《詩序》與《毛傳》，即《鄭箋》也棄而不從，其敘文甚至自稱“墨守之譏，在所不辭”。又如乾嘉考據學家對釋、道之學及詞章、小說、戲劇、藝術等皆持排斥態度，等等。因此，如將“膠固、盲從、偏狹，好排斥異己”之罪全歸惠派，則恐惠派學者不受，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嘉慶九年（1804），錢大昕病逝於紫陽書院院長任上。這時，高潮已過的考據學已開始走向了衰微：其一、像惠、戴、錢那樣能主持學界並產生巨大影響的考據學大家不再出現，學者多各名一學，進行窄而深的研究；其二、考據學流弊日多，已逐漸成為被激烈攻駁的對象；其三、清王朝走向衰亡，社會各

種矛盾日趨激烈，太平天國運動不僅給了清王朝以重大的打擊，也給了考據學中心的江南學術界毀滅性的打擊；其四、今文經學興起，並日趨強盛。在這樣的情形下，考據學派內部以焦循、凌廷堪、阮元、江藩等人為代表，他們一方面主張學術變革，調解漢宋之爭，另一方面如阮元主纂《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經籍纂詁》、《疇人傳》，江藩著《漢學師承記》、《經解入門》等，開始總結當代學術成果並做出評價。至清末俞樾、孫詒讓、王先謙諸人，對乾嘉考據學棄其短而揚其長，惠、戴、錢三派之界已泯然無存。至章炳麟、王國維等人則更是開新造大，成為繼往開來的新一代宗師。

注 釋

- [1] 汪中《述學外篇·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粵雅堂叢書本。乾嘉學者共尊惠、戴，言論尚多。見王鳴盛《西莊居士始存稿》卷24《古經解鈞沈序》，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9《邵學士家傳》，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23《與胡敬仲書》，焦循《雕菰樓集》卷13《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江藩《漢學師承記》卷1，阮元《學經室一集》卷5《王伯申經義述聞序》等。
- [2] 論吳中之學者見孫星衍《平津館文稿》卷下《江聲傳》，論徽州、嘉定之學者見焦循《雕菰樓集》卷21《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孝嬰別傳》，論嘉定之學者見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咸豐庚申十二月十一日《十七史商榷》條，論揚州之學者見《雕菰樓集》卷21《李孝臣先生傳》，又綜論乾嘉學者在東南諸省地理分佈者見《越縵堂讀書記》咸豐辛酉六月十七日《珍藝宦文鈔》條，等等。
- [3] 章炳麟《檢論·清儒》，《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4] 案：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一、卷八為清初學者，卷二至卷四為惠棟、錢大昕諸人之學，卷五至卷六為江永、戴震、盧文弨等人之學，卷七為汪中、凌廷堪等揚州學者之學，當為章氏說之祖，其人物歸隸也襲江氏卷次所分，惟將清初學者棄去，將揚州諸人並入惠棟門下而已。
- [5] 參見李洵《關於乾嘉學派的學術通信》，載《清史研究通訊》1984年第3期。
- [6]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頁。諸家之說，可參見柴德賡《章實齋與汪容甫》，載《史學叢考》第293頁；戴逸《中國傳統文化·清代思潮》第323頁；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與文化》第368—388頁；陳祖武《乾嘉學術與乾嘉學派》，載《文史知識》1994年第9期。

- [7] 阮元《擘經室二集》卷4《通儒揚州焦君傳》，中華書局1993年5月版，第481頁。
- [8] 我在1990年完成碩士學位論文《試論乾嘉時期的校勘學》時，就將惠、戴、錢分爲三派，關於錢氏之學，可參拙文《論錢大昕考據學成就及其學術地位》，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三輯），中華書局1995年12月版，第146—167頁。
- [9] 惠棟《易漢學》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影印本，第3頁。
- [10] 錢儀吉《碑傳集》卷46鄭方坤《惠吉士周惕小傳》，中華書局1993年4月版，第10冊第1293頁。
- [11] 惠棟《後漢書補註》顧棟高序，嘉慶九年德裕堂刻本。
- [12] 惠棟《松崖文鈔》卷2《學福齋集序》，光緒廿五年貴池劉世珩輯刻本。
- [13] 惠棟《九曜齋日記》卷2“本朝經學”條，聚學軒叢書本。
- [14]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書》，《四部備要》本。
- [15] 《碑傳集》卷133王昶《惠先生墓誌銘》，第11冊第3985頁。
- [1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第308頁。
- [17] 同上書第310—311頁。
- [18] 戴震《戴東原集》段玉裁序，經韻樓叢書本。
- [19] 同上書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
- [20] 同上書卷11《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 [21] 《尚書義考》只完成《堯典》、《舜典》兩篇，餘皆闕如，書中引惠棟《尚書古義》並採惠說甚多，且步依漢儒，與前期所著《屈原賦註》、《毛鄭詩考正》等風格迥異，當爲戴氏見惠棟後所著無疑。
- [22] 案：段玉裁撰戴氏《年譜》不載《經考》，梁啓超《戴東原著書纂校書目考》以其附“著書年月失考者”下。許承堯《經考附錄校跋》認爲此書爲戴氏早年治學之札記，成書於戴氏從江永治學於不疏園之時，與《屈原賦註》同時。又羅更《經考附錄校記》認爲此書後來屢有增益，“而其寫定，尚在丁丑三十五歲以後”。然則《經考》及《附錄》主要寫成於三十歲以前當不成問題。
- [23] 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同治癸亥正月二十四日條引翁方綱語，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 [24] 同[16]第322頁。
- [25] 冒懷辛《孟子字義疏證全譯》，巴蜀書社1992年7月版，第27頁。
- [26]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26《習菴先生詩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36頁。

- [27] 王鳴盛《西莊居士始存稿》卷32《樸村集書後》，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 [28] 同[26]卷38《嚴先生衍傳》，第627頁。
- [29] 楊震福等纂光緒《嘉定縣志》卷19《文學·李宜之傳》。
- [30] 錢氏在《文集》卷三十八為前輩學者立傳，依次為嚴衍、閻若璩、胡渭、萬斯同、陳祖範、惠士奇、王懋竑，從中亦可看出他對嘉定之學的重視和給予很高的位置。尤其是集中卷三十九為同時人立傳，依次為惠棟、江永、戴震、錢塘，此更見錢氏將其家學與惠、戴兩家鼎立三分之微意。
- [31] 同[26]卷50《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第868頁。
- [32] 同上書卷22《記先大父逸事》，第364頁。
- [33] 錢氏之說見其為趙翼《廿二史劄記》所作序文中，其論大同於章學誠之說。
- [34] 同[26]卷24《漢書正誤序》，第397頁。
- [35] 《九曜齋筆記》卷2“錢吳”條。
- [36] 同[26]卷24《古文尚書考異序》，第384頁。
- [37] 同[20]。
- [38] 同[36]。
- [39] 案：段《譜》謂戴氏入都在乙亥年（1755），紀昀《考工記圖序》亦云“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然錢大昕《戴先生震傳》及錢氏自撰《年譜》、王昶《戴東原先生墓誌銘》、凌廷堪《戴東原先生事略狀》等均記戴氏入都在甲戌年。錢氏為表彰戴氏之第一人，所記當不誤，且段《譜》甲戌年無事可隸，然則戴氏入都當以甲戌年為確。
- [40] 錢大昕自編《錢辛楣先生年譜》，長洲龍氏家塾重刊潛研堂全書本。
- [41] 同[26]卷39《戴先生震傳》，第711頁。
- [42] 同上書卷33《與戴東原書》，第597頁。
- [43] 同上書卷29《跋水經注新校本》，第513頁。
- [44] 同[41]。
- [45]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經韻樓叢書本。
- [46]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3《錢大昕記》引戴震語，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版，第50頁。
- [47] 李詳《媿生叢錄》卷2，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
- [48] 同[40]。
- [49] 錢東壁、錢東塾《竹汀府君行述》，清姚氏師石山房抄本。

- [50] 錢慶曾《竹汀居士年譜續編》，長洲龍氏家塾重刊潛研堂全書本。
- [51] 洪亮吉《卷施閣文乙集》卷5《復錢少詹書》，四庫叢刊初編縮本。
- [52] 同〔50〕。
- [53]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24《復錢曉微先生書》，道光六年宣城張氏刊本。
- [54] 臧庸《拜經文集》卷3《謝錢曉微少詹書》，漢陽葉氏刊本。
- [55]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3《錢大昕記》，第50—51頁。
- [56] 同上書卷6《盧文弨記》，第91頁。
- [57]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2《九經古義序》，民國十七年涵芬樓影印本。
- [58] 盧文弨《鍾山札記》卷1“《蔡中郎集》”條，抱經堂叢書本。
- [59] 同〔57〕卷2《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 [60] 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見《笥河文集·卷首》，畿輔叢書本。
- [61] 汪中《述學外篇·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粵雅堂叢書本。
- [62] 汪中《述學別錄·與巡撫畢侍郎書》，粵雅堂叢書本。
- [63] 焦循《雕菰樓集》卷12《國史儒林文苑傳議》，文選樓叢書本。
- [64] 阮元《擘經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傳》，第465頁。
- [65] 同〔26〕卷43《日講起居註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第787頁。
- [66] 洪亮吉《卷施閣詩》卷8《靈巖天竺集·有人都者偶佔五篇寄友》其二，四庫叢刊初編縮本。
- [67] 江藩《經解入門》卷4“說經必先明家法”第二十七，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年6月版，第127頁。錢大昕對自己表彰提拔戴震、邵晉涵於微末，也頗感自豪。他曾感嘆云：“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指邵晉涵）。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間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嘗預誡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孰意天實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泫然而失聲也。”此亦足見錢氏對邵氏之器重以及邵氏早逝給錢氏帶來的傷悼之情。見錢氏《文集》卷43《日講起居註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第787—788頁。
- [68] 同〔51〕。
- [69] 同〔27〕卷24《古經解鈎沈序》。
- [70] 同〔16〕第324頁。
- [71] 同〔15〕卷42王昶《王鳴盛傳》，第4冊第1171頁。
- [72] 同〔26〕卷24《臧玉琳經義雜識序》，第391頁。

- [73] 同上書卷 25《盧氏群書拾補序》，第 421 頁。
- [74] 同上書卷 9《答問》六，第 118 頁。
- [75] 同 [27] 卷 24《五禮通考序》。
- [76] 吳承仕《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集》第 347 頁。
- [77]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十，東方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版，第 30—31 頁。
- [78] 同 [16] 第 321 頁。
- [79] 孫星衍《五松園文稿·章宗源傳》，光緒十一年長沙王氏刊本。
- [80] 張惠言《茗柯文二編》卷上《周易虞氏易序》，四庫叢刊初編縮本。
- [81] 同 [63] 卷 13《與劉端臨教諭書》。
- [82] 同 [13] 卷 2“不知而作”條。
- [83] 李集《敬堂鶴徵錄》卷 3“惠周惕”條，嘉慶五年李氏家刊本。
- [84] 江藩《周易述補》凌廷堪序，道光九年江氏家刻本。
- [85] 同 [69]。
- [86]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下冊)，中華書局 1994 年版，第 952—953 頁。
- [87] 同 [26] 卷 17《朱文公三世像贊》，第 274 頁。
- [88] 同 [63] 卷 21《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別傳》。
- [89] 同 [46] 卷 5《金榜記》，第 78 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